

强化党管意识形态:基层单位网络阵地管理的难点与突破

合肥城改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阁

摘要:数字时代背景下,网络空间是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。基层单位是思想工作的前沿关口,而其网络阵地管理直接关系思想安全与社会稳定。本文紧扣党管意识形态、党管网络的核心原则,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指导思想为根本遵循,结合基层工作实际,梳理阵地管控、宣传引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,并提出针对性解决办法,为基层筑牢网络思想防线提供实践参考。

关键词:基层单位;网络意识形态;阵地管理;风险防控

引言: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、为民族立魂的工作。网络空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,而直接面向大众的基层单位,则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当前,网络思潮纷繁复杂、传播态势瞬息万变,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风险隐患也日益凸显。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则,破解基层网络阵地管理难题,是筑牢基层思想根基、守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的必然要求。

一、基层单位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现实

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式演进与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,人类社会正经历从数字化、网络化向智能化跃迁的深刻范式转型。在此背景下,重读毛泽东同志的《实践论》,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回归,更为我们在数智浪潮中锚定认知坐标、把握实践主动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
一、数据是“原料”而非“真理”

《实践论》开宗明义:“人的认识,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,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、自然的性质、自然的规律性、人和自然的关系;而且经过生产活动,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。”这一论述揭示了认识的本质——它不是头脑中自生的“观念游戏”,而是源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。数智时代,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,但数据的本质,不过是实践过程的数字化记录,是认识的“原材料”而非“成品”。

当前,一种“数据拜物教”倾向悄然蔓延:认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数据,就能通过算法自动得出“真理”。这恰恰印证了《实践论》的警示:“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(不是零碎不全)和合于实际(不是错觉),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。”数据若脱离具体的实践场景,若未经实践的检验和筛选,就只是“零碎不全”甚至“错觉”的材料,无法上升为正确的认识。

数智技术拓展了实践的范围,但并未改变

实难点

(一)阵地管控体系不完善,责任落实存在漏洞。党管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遵循,但部分基层单位尚未建立覆盖全面、运行常态化的网络阵地管控体系。基层网络阵地类型多样,涵盖官方账号、工作群组、自媒体等,存在阵地底数不清、台账不全、私人网络载体监管空白等问题。基层“重业务、轻思想”的倾向较为突出,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流于形式,权责划分不明、考核追责机制缺位,未能形成党组织统一领导、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,导致网络阵地易成为不良思潮渗透的薄弱环节。

(二)正面宣传质效不足,思想引领力度薄弱。基层网络宣传虽严格遵循党的正面宣传导向,但普遍存在形式固化、内容单一的问题。宣传内容多以文件、通知转发为主,原创性、本土化优质内容匮乏,表述刻板,难以引发大众共鸣;宣传形式较为传统,未能充分利用短视频、新媒体推文等传播载体开展主流思想传播,导致主流思想的传播穿透力不足。面对复杂多元的网络思潮,主流价值引领力不强,

难以有效抵御负面网络信息的侵蚀。

二、基层单位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突破路径

(一)健全管控工作机制,压实党建主体责任。以党管网络、党管意识形态为原则,基层单位需建立规范化、常态化的阵地管控机制。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,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重点任务范畴,明确各岗位职责权限,构建层层落实的责任体系;对全域网络阵地开展全方位摸排,建立动态管理台账,严格执行账号备案、内容审核、日常巡查等制度,实现阵地管理全覆盖;完善考核追责机制,将管理成效纳入绩效考核,以考核倒逼各项管控措施落地,筑牢制度防控防线。

(二)创新正面宣传模式,强化主流思想引领。基层党组织要遵循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方针,坚持正面宣传、凝聚人心的工作方向,优化基层网络宣传的内容与形式;要以群众关切为出发点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,结合自身资源优势,挖掘一线岗位、先进典型、生产生活等本土化素材,创作有温度、接地气的宣传内容,用通俗易懂的方

数智时代重读《实践论》的现实启示

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征一

“实践是认识的来源”这一根本逻辑。无论AI工具多么先进,其本质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数字化映射。正如马克思所言,“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”,数智时代的认识活动,依然要从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中汲取源头活水,而非陷入数据的“自我循环”。

二、算法迭代印证“辩证运动”

《实践论》深刻阐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:“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、再认识,这种形式,循环往复以至无穷,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,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。”这一螺旋上升的规律,在数智技术的迭代中得到了生动体现。

以众多新技术的研发为例,其过程正是“实践—认识—再实践”的典型体现:工程师首先基于既有经验编写初始算法,完成认识的第一次飞跃;随后通过实践检验,发现算法在复杂场景下的偏差,形成新的感性认识;进而通过优化模型参数、补充训练数据,上升为理性认识,最终推动技术系统性能的提升。这一过程,与《实践论》中“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,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”的论述高度契合。算法的每一次升级,本质上都是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深化;而技术应用的每一次突破,都离不开实践对认识的检验和修正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数智时代的“再实践”具有前所未有的高效性,但这并未否定实践的决定性作用,反而更凸显了《实践论》的前瞻性——技术只是工具,真正的认识飞跃,始终依赖于实践提供的“真实反馈”。如果脱离实际应用场景,仅靠实验室里的“纸上谈兵”,再先进的算法也会沦为“空中楼阁”。

三、坚守实践的主体性

数智时代的一个隐忧,是人的主体性面临被技术消解的风险。《实践论》强调:“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,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,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。”这种“自觉的能动性”,是人区别于人工智能的根本特征。

《实践论》对“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,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”的批判,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。唯心论夸大意识的作用,机械唯物论则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,二者的共同问题在于割裂了认识与实践的统一。数智技术越是发展,我们越要警惕陷入“算法决定论”的误区——算法可以辅助决策,却无法替代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判断力;数据能够提供参考,却不能取代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:“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,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。”在

《封锁》中的城市生命体寓言

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王艺杰

悄然潜伏。银行会计师吕宗桢的体面身份、中产阶级家庭好女儿吴翠远的角色,以及总试图攀附亲戚关系的董董芝——每个人都被固定在特定位置,扮演着社会期待的角色。这些无形规则维系着表面的平静,却也压抑着真实的情感。都市光鲜的外表之下,是阶级的隔阂、人心的疏离与普遍的倦怠。战争阴云笼罩下的上海,其日常生活看似如常,实则是一种带伤前行的脆弱状态。

封锁的到来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。它并非日常的小插曲,实则是一次突然的休克。张爱玲写下了那个瞬间:“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……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。”“盹着”在这里不是惬意的休息,而是生命体在重击下的短暂昏迷。车轮停止转动,商店关上大门,街道突然空旷,城市的血液循环被切断了,那些维系着日常生活的规则也随之悬置。当警报声取代了市井的嘈杂,当每个人都被困在原地,原有的身份和阶层忽然变得模糊。此时,那辆停下的电车成为观察一切的绝佳窗口。它不再仅仅是交通工具,而更像一个在危机中被隔离出来的特殊空间,其中发生的一切,都是城市生命体在极端状态下的本能反应。

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,为了躲避讨厌的亲

戚董董芝,体面的吕宗桢做出了平时不会有的选择——他坐到了素不相识的吴翠远身边。这一简单动作,不经意间越过了那道无形的阶级界线。随后发生的事情更像是一场梦,两个陌生人开始交谈,而且谈论的内容也越来越深入。吕宗桢说起自己对婚姻的厌倦,吴翠远倾听并回应。他们的对话渐渐从最初带有避难性质的搭讪,迅速滑向亲密的倾诉、刻意的恭维,甚至是带有情色暗示的试探。在这特殊时刻,银行会计师与学校英文助教的社会身份褪了色,他们暂时成为两个纯粹的人。这种交流在平时的上海几乎不可能发生,但在这里,在封锁造成的异常氛围中,某种东西被释放了出来。那不是爱情,至少不完全是。它更像是人在极度压力下对慰藉的本能渴求——正如身体在剧痛时会分泌镇痛物质,困在电车里的两人,正借由彼此的关注来缓释战争的恐惧、生活的庸常与存在的孤独。他们共同编织了一个短暂的梦:梦里没有战争的阴影,没有必须扮演的社会角色,只有两个能相互理解的灵魂。

然而,梦总是要醒的。当封锁解除的铃声响起,现实以不容置疑的力量回归。封锁期间的一切,等于没有发生。吕宗桢迅速退回到银行会计师的壳里,变回那个体面而有家室的男

式阐释党的方针政策与主流价值观;遵循新媒体传播规律,通过短视频、推文、直播等多元载体创新宣传模式,打破传统宣传的刻板印象。

三、总结

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,基层是守护网络思想阵地的第一道防线。新时代基层单位需始终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,坚持党管意识形态、党管网络原则,直面阵地管控与宣传引导的突出问题,通过健全管控机制、创新正面宣传模式,补齐基层工作短板、净化网络生态,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,为基层平稳发展筑牢思想根基。

参考文献:

[1]孙云霞.曲靖新闻网多措并举夯实网络意识形态阵地[J].城市党报研究,2025,(11):60-62.
[2]周艳.网络阵地建设研究综述[J].继续教育研究,2023,(03):20-25.
[3]吴闯.新媒体语境下建筑央企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探析[J].传播力研究,2020,4(07):186-188.

数智领域,这意味着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让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,而非使人沦为技术的附庸。

四、《实践论》的时代新篇

当前,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数智技术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赋能手段。《实践论》为我们正确处理技术与实践、认识与行动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。

一方面,要以实践需求牵引技术创新。我国数智技术的发展,必须立足人口规模巨大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基本国情,聚焦产业升级、民生改善、社会治理等实际问题。另一方面,要以实践标准检验技术成效。技术的价值不在于“炫技”,而在于能否真正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增进民生福祉。任何数智应用,都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、人民的评判,坚决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技术“花架子”。

从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革命实践,到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改革探索,再到今天数智时代的创新突破,《实践论》始终是照亮我们前行道路的思想灯塔。它告诉我们:无论技术如何迭代,实践始终是认识的基石,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;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“知行合一”的智慧,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。在数智时代的浪潮中,唯有坚持“从实践中来,到实践中去”,既善用技术之力,又坚守实践之本,才能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,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书写新的实践篇章。

人。他对待吴翠远的态度瞬间冷淡,仿佛刚才的交谈从未发生。电车门打开,人们涌向街道,城市重新开始运转。商店开门,电车恢复行驶,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来的轨道,但这种恢复并非完好如初。对于吕宗桢,他可以告诉自己那只是个意外,然后继续原有的生活。但吴翠远的感受却复杂得多。那个短暂而真切的连接被突然斩断,留下的是一种深深的惘然。她曾经被看见、被倾听,甚至觉得自己被珍视,而这一切在铃声响起时被证明只是一场幻觉。这种惘然不会随着封锁结束而消失,它会像一个不起眼的小倒刺,留在生命的肌理中。在城市的尺度上,封锁是一次集体的休克,而那些发生在电车里、公寓里、街头巷尾的微小越界与连接,便是休克中产生的集体梦境。梦境荒诞却不无真实,它暴露了日常生活所掩盖的渴望与匮乏。

《封锁》之所以深刻,在于它超越了社会批判,触及了现代都市生存的本质。透过这一微小的生活切片,张爱玲让我们窥见:城市恰似一个庞大的生命体,其内在平衡既精密又脆弱——它既赋予匿名者的自由,又以无形的规则将个体隔绝开来。当危机来临,系统会本能地保护自身,哪怕要抹去那些在缝隙中生长的真实。如此,一个获得了主体意识与身体形态的上海,便从城乡二元书写格局中突破出来,引向更为复杂的面向,也回到层次更为多元的都市内部,聚焦其中的集体与个体意识。